



# 延安革命文学与

造着主观世界。他们挥动那饱蘸生活油彩的巨笔，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新的世界，新的题材，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开创了我国革命文学艺术的新天地。

在我们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留恋忘返的时候，当我们在深思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基本特质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我们非常欣喜地感觉到，延安革命文学的成功经验（甚至包括它的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独特的借鉴意义。

那么，它的经验是些什么呢？

首先就是创新。创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它不断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创新是灵魂，是生命线，是最可宝贵的基本品质。正像列宁曾指出的：“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正是以强烈的积极的开拓进取精神，以敢于开风气之先，敢于标新立异的文学新观念，走向了文学创作的创新之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众所周知的女作家丁玲，是在经受了时代风雨的磨砺之后，毅然决然地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对于她是陌生的。然而当她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之后，当她逐渐了解了这里的人民群众及其干部之后，她的思想、文学观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她情不自禁地拿起那支“纤笔”，写下了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迥然有别的，反映新时代、新人物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一时之间，在延安文坛

延安革命文学指的就是诞生于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文学。当时的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所以人们就把延安作为解放区的代名词而使用了。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1月），深刻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特点及内容。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纲领性的文献，同时又体现着先进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要求。延安革命文学就是在这两个文献的科学理论的哺育下，诞生并发展着的新的人民的文艺运动。

如上所述，延安不仅是先进文化的发祥地，它还是古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的积淀地。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多数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来到这个地区，接受了先进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纷纷投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

# 中国文化建设

## □党秀臣

上掀起了狂涛巨澜，打响了延安革命文学创新的第一炮！

被誉为“人之子的觉醒”的短篇小说《夜》，就是一例。与其说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优秀基层干部何华明的形象，倒不如说它是通过何华明在新的文明世界中的迷惘与彷徨，思索与追求，揭示着人物精神世界出现的空虚、寂寞和危机：又老又丑又没文化的妻子，年青漂亮有活力有文化的妇联主任侯桂英；该爱的爱不起来，不该爱的又强烈地吸引着。这是新旧文化的冲撞。何华明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撞击之中，感受到难耐的寂寞与空虚。怎么办？作品结尾用象征性的笔法指出，何华明还是认同了新文化（这不

说明文艺的创新是多么的重要，又多么的需要以极大的艺术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努力作为前提。

孙犁的《荷花淀》被誉为解放区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原因也在于此。它从一个独特的艺术角度，把普通的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无私奉献精神，揭示得那样深刻而自然，那样真实而朴素，那样的富有诗意，令人叫绝。假如作者仍囿于一般惯用的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模式之中，仍然是着力于正面表现战斗之激烈，子弟兵之英勇、顽强，那么它不可能达到现在取得的艺术效果。而当他捡取了大波大澜中的一个微澜，一个浪花，并加以精雕细刻之后，以水生嫂为代表的解放区妇女们的博大胸襟及其美丽的心灵世界，对革命战争正义性质的深刻理解以及英勇不屈，大义凛然，机警应变的品格才能得以最明晰的展现。小说不仅显示出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而且成为“荷花淀派”的源头。

其次是“拿来”。敢于创新，就敢于“拿来”。“拿来”就是借鉴，就是从中外古今的文化遗产和文艺作品之中，借鉴其优秀的精华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讲话》）也像鲁迅在《拿来主义》中说的：“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不仅深明此理，而且将其自觉的付诸文艺创作的实践中，使得革命文学不断地由一个高度向另一个新的高度攀登。

1938年来到延安的年青人李季（当时他不是文学家），首先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熏陶，接着即投身革命战争和革命工作的实践。因为调查一起离婚案件，接触了陕北民歌信天游。他被这黄土文化酿造出的、富有地方特色和丰富表现力的信天游所感动，所陶醉，于是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搜集、整理出3000首左右的信天游。当他在创作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时，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拿来”了。这首长诗于1946年9月22、23、24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之时及其之后，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因为它不只运用了信天游这一体式，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新诗写作的严肃课题，说得更广泛一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陆定一：《读了一首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新歌剧《白毛女》，更能体现出解放区作家的艺术胆识和魄力，从而使它成为中国新歌剧的报春花，并引发出《赤叶河》、《王秀鸾》和《刘胡兰》等歌剧相继问世，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树起一个里程碑。

《白毛女》的成功，证明了前面引用的鲁迅、毛泽东



是说他就要与老婆离婚），从而揭示出革命干部积极追求，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作者把笔触深入到贞贞的心灵世界之中，揭示了她对世俗偏见的反叛，赞扬了贞贞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解放自己的独立卓行的思想品格，开拓并深化了妇女解放的主题。而那部给她带来盛誉和灾难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是更能



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精神实质，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继承和发扬这些经验，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在这里，一要彻底放下文明古国之类的文化包袱；二要记取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真正认识深刻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牢固树立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创新的自觉性、主动性，以创新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是艰难的，是

论断的科学性。正如该剧的执笔者丁毅说的那样：“从秧歌剧发展到新歌剧可以《白毛女》一剧的产生作为标志。在内容上，它更深刻更广阔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斗争，更细致地刻画了人物，描写了人民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激愤和仇恨，对新社会的热爱。在形式上，它不但继承了民族戏剧的传统，也吸取了活剧和西洋歌剧的艺术经验，使它有了更丰富的表现能力。特别是在音乐上有很大的发展，它已不再是用旧有的曲调配词，而是以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作为素材，以民族音乐语言为基础，经过创作，构成它的音乐，因而能够更具体，更细致地刻画人物情感；它运用了西洋歌剧主题发展的方法，因而能较完整地塑造了人物的音乐形象；它采用了重唱合唱等音乐体裁，因而能表现群众力量；它采用了更多的乐器，发展了描写音乐，因而给戏剧以更大的感人力量。正因为如此，这种从秧歌剧发展起来的新歌剧才能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时它所表现的新的生活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才能取得协调一致。”（《新歌剧发展的道路》）。这段话，不仅道出了《白毛女》借鉴了些什么，而且强调指出借鉴决不是照抄照搬，不是简单的摹仿，借鉴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发展。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推陈出新，才能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境界。

延安革命文学的经验当然不是只有这两条，但它是最重要的两条。这两条经验沿着创新——借鉴——创新的轨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既构成了延安革命文学的显著特征，又切合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亦

有风险的，创新也可能出现失误或失败。但是，不创新是绝对不行的。延安革命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上的创新在开始之时，也出现过不为人们理解，不被人们接受，甚至遭到粗暴地批评和无情地打击；但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有出息的、有气魄的文学家就要坚持创新，与时俱进。这不仅是被中外文学史，也是文化史、科技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延安革命文学的经验还向我们指出，借鉴是在学习前人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扬弃旧义，探求新知，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艺术创新。当前，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思潮、文学思潮涌入了中国。正是在这时，就必须学会鉴别，分清哪些是对建设中国文化有用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腐朽的，或吸收，或扬弃，或批判，以推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当前，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是正面教育，积极引导，主要通过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文件，达到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增强思想道德品质的目的。一方面是对那些消极的、错误的文化思想、不文明行为，及时予以揭露与批评，从而唤起人们的警觉，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我们就是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延安革命文学继承传统文化时那样一种科学、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一股子勇于推陈出新的劲头，从而在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中，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本文责编：金 人）